

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

废墟上的

杨洪承◎著

精灵

人
民
出
版
社

废墟上的精灵

杨洪承·著

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1898—1918)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废墟上的精灵/杨洪承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6. 8

ISBN 7 - 01 - 005704 - 4

I. 废… II. 杨… III. 知识分子 - 研究 - 中国 - 1898 ~ 1918

IV. D693. 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7558 号

废墟上的精灵:

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的理路 (1898 - 1918)

FEIXU SHANG DE JINGLING

作 者: 杨洪承 著

责任编辑: 林敏

装帧设计: 鼎盛怡园设计室

版式设计: 鼎盛怡园设计室

出 版: 人 民 出 版 社 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60 千字 印 张: 11.75

书 号: ISBN 7 - 01 - 005704 - 4

定 价: 29.00 元

邮购地址: 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开篇语	苍凉的帝国遗风	1
第一章	王朝解体的碎片	14
第一节	传统樊篱的焚烧者	15
第二节	“新思想界之陈涉”	21
第三节	康、梁“新学”与新型知识分子的诞生 ...	28
第二章	冲决网罗的呐喊	37
第一节	思想的大革命与批判的立场	39
第二节	精神内核与思想体系的创新	45
第三节	世纪之交的心灵放歌	50
第三章	文明火种的播撒	55
第一节	西学东渐的文化思想传播者	56

第二节	《天演论》与近代进化观念	63
第三节	追求民族富强的“浮士德”精神	70
第四章	传统与现代的抉择	78
第一节	章太炎：真与俗的双向流程	79
第二节	真与美的理想人生	87
第三节	苏曼殊：新旧徘徊的“断鸿零雁”	97
第五章	群落聚散两由之	106
第一节	新知识界从个体到群体的演变素描	107
第二节	群体的个案：“中国教育会”、“南社” ...	115
第三节	开智合群导引着新思潮的走向	128
第六章	改弦更张的匆匆过客	135
第一节	革故鼎新：晚清“新政”系列举措 ...	136
第二节	教育为本：京师大学堂	145
第三节	留学之潮：西洋、东洋初识世界	155
第七章	西学东渐的文化转型	168
第一节	中体与西学撞击中观念大调整	169
第二节	现代媒体：报刊与“商务”出版业 ...	182

第三节	现代科技革命推动前工业繁衍	195
第八章	“城头变幻大王旗”	208
第一节	奔走呼唤建立革命大同盟	209
第二节	革命先驱者的思想精髓	220
第三节	从王朝到民国潮起潮落	233
第九章	思想启蒙的文学革命	247
第一节	“文学”治国救国的新武器	248
第二节	两位“先生”引领着新青年	263
第三节	革命话语催生“人之子”觉醒	274
结 语	世纪之交的眺望和期盼	282
附 录	前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大事年表	
	(1898 ~ 1918)	297
	主要参考文献	362
	后 记	364

开篇语 苍凉的帝国遗风

1898 年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值得分界的年代。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并不仅仅因为维新变法的此起彼伏，大清帝国摇摇欲坠，而是在这维新时代中产生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集团——中国前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

大清帝国的辉煌，在 19 世纪 90 年代激荡的政治思想风云变幻中走向了衰落。中国人称为“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语）*，由 1840 年英国的大炮予以了改写。中国为此打开了封闭已久的沉重之门，历史涂抹了更为悲壮而苍凉的色彩，自诩的“天朝”将何去何从……

历史的重任自然地落在了一批率先“睁眼看世界”的、先觉的忧国忧民的知识者的肩上，可以列出林则徐、魏源、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孙中山……一串长长的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开创者和奠基者的名字。他们为一个衰落的王朝抒写了一曲最为悲壮的挽歌，也为一个新的历史开篇谱写了鲜活而丰富的精神与生命的乐章。是社会时代的变革，是民族危亡

* 本书中括号内文字为作者加注。

的灾难，是切切实实奇耻大辱的刺激，将他们推到了不容异议、不容怠慢、不容选择的境地。尽管他们身上有几千年的王朝帝国的沉重负载，尽管他们已经有了“悉夷—师夷—制夷”的应变措施，也经历了洋务自强运动，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使得他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更为深广的文化思考，尤其，从异域文化的参照来探寻社会变革的新火种。悠悠几千年的封建王朝，真正走到了岌岌可危的穷途，同时，慢慢地开启了一个新的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帷幕，那低沉忧郁的序章也旋即奏响。

蔡锷在1902年的《军国民篇》中回顾道：“甲午一役以后，中国人士不欲为亡国之民者，群起以呼啸叫号，发鼓击钲，声撼大地。或主张变法自强之议，或吹煽开智之说，或立危词以警国民之心，或故自尊大以鼓舞国民之志。未几而薄海内外，风靡响应，……”^①这便是新近代思想文化滋长的社会历史的河床，是一个新知识群体的诞生孕育的外在动力。近期的中日甲午之战的惨败，远期的鸦片战争的浓浓硝烟的弥漫，在举国上下的震惊与悲愤的双向契合之中，危机与忧患的精神情绪奠定了新的知识、新的学理、新的价值、新的文化观念孕育的基石。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的精神历程，寻踪由此线路伊始……

1898年的春夏之交，维新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正是中日战争中的大清帝国遗风彻底的沦丧。这场丧权辱国的战争，对

^① 毛注青等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页。

于中国民众的刺激超过了历次战争之最。早在几年之前，酝酿变革维新的浓浓的社会意识，正在寻找着喷发口。如果说大清朝与日本1895年4月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时，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三千三百名参加会试的士子联名签署反对和约要求变法维新的奏折，是一个民意激发的前奏曲，那么，随后愈演愈烈的外来列强的争夺，殖民地危机下的国内一片惊慌恐惧，则加剧了大清朝的衰亡，同时促使了维新运动的深入。这是一幕颇具戏剧性的历史转折，走向衰落的朝廷，上演了一出垂帘听政的权力新组合的闹剧。在母后亲情和孝治的多重关系笼罩下，光绪帝的忠顺和服从，本身就蕴涵着权力的不满，紧张和冲突就在这种表层的亲和之中。1895年光绪24岁，慈禧则为60岁。差别更重要的在于，他们之间对传统的维护和对西学的接受之思想观念方面。最终帝与后之间的对峙发展成意识形态之争，这是大清帝国开始崩溃的前兆。1897年冬，康有为再度进京重新向皇帝送上三道奏折，条陈要求变法，公开提议颁布宪法和建立国会。光绪帝对此反应强烈，接纳了康有为的变法革新的主张，直接演绎了一场短暂而辉煌的“百日维新”。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这一百天中，光绪帝连续颁布了一百多道上谕，顺应有识之士的改革要求，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拟对帝国全部政治机构进行激烈的改造。与此同时，变法运动加剧了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也促使了朝廷普遍的忧虑和不安。9月下旬，慈禧太后很快地剥夺了光绪帝的权力，并将其囚禁起来，旋即康有为等维新运动的激进者受到清洗，一系列变法期间颁布的革新政策也被废止。

慈禧太后的第三次摄政，“六君子”遇难，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物纷纷避逃香港、日本。短命的维新流产了，大清朝廷已到了真正的苟延残喘之状和最后的生命回光返照之态。1900年起，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在维新改良的参照之下，在更为日趋严重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民族灭亡危机的逼迫下，在下层人民以朴素的方式展开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及义和团无畏勇士们的血与火的鼓舞之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崛起。1905年夏，又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外部的直接事件是日本战胜了俄国，列入世界强国，引发在日本学习的中国人的极大兴趣，认识到亚洲人是可以战胜西洋人的。孙中山率先打出以革命为宗旨的旗子，组织团体聚集力量，志在推翻朝廷，建立民国。从兴中会到同盟会，革命党人彻底跳出维新改良的君主立宪的困境。同盟会的誓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伴随着孙中山一次次革命起义的尝试，虽然多为失败的尝试，但仍是顺应了民意民心。孙中山所强调的基本革命主张，统一、主权和国家强盛，恰恰直指清王朝致命的丧权辱国，甚至也针对了那些表层的革新——君主立宪的改良。为此，共和革命运动、团体联盟、反满独立等一系列革命的实际举措，与清朝所谓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共同加速了自身真正意义的改革措施的重新反省。1911年的辛亥革命聚合了十余年的经验，将清王朝推到了末日，重写了民国的新一页。

匆匆将19世纪末的社会历史的发展线索做此粗略的勾勒，并不在于对晚清史的思想革命独创性的描述，而是由此为思想

文化历史的考察，寻觅和清理出包容其中的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多元思想精神的内在理路。

清王朝的穷途联系着民族危机，而民族的危亡直接反映在先觉者的忧患意识中，这种首先出自精英阶层的忧患，将河山破碎的悲愤、救国的豪情壮志渗透到一切思想精神文化的领域，影响了一批批思想精神的先觉知识分子。大清帝国苍凉的遗风，率先由一批感时爱国的知识者，从长歌当哭的悲壮的旋律中传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近代开篇伊始林则徐就播散了这一悲壮之音的基调。随后，谭嗣同抒发出“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的沉郁情怀，与“鉴湖女侠”秋瑾激昂地唱出的“拼将十万头颅血，敢把乾坤力挽回”的民族正气之歌，彼此交织着贯穿在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历程中。

清王朝的政治格局影响了文化思想的变革。近代史的重大转折，甲午战争激发的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也推动了新的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用救国”等口号接连提出。文化的革新意识被提到与整个社会发展的相关地位，从而产生了一大批不同于死守传统儒学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广泛接受、介绍西方思想文化的热潮。正是一批头脑清醒、有胆识的先进人士，敢于正视现实，将吸收西方文化以补充中国文化的不足为己任，其艰难寻求、探索的过程，抒写了一部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新篇章。可以说，1895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所言，可谓一种新的文化观的宣言：“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理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①。这种崇尚西方文化的意识，开启了一代先觉的知识者，从一种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中，探寻中国思想文化的新出路，从而从根本的精神上动摇了封建的纲常伦理观念，加速了王朝帝国的彻底颠覆。这里不仅仅是对近代以来“用夷变夷”、“中体西用”等改良口号的反思，而且开始从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建构一系列变革和创新的思路。

首先，社会经济领域探索冲破封闭农业手工业形态，引进介绍工业化的都市社会学和商业化的经济学，尤其从理论上强化社会体制变革的重要。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的社会学，主要是从医治封建专制的社会弊病和重新组织社会问题出发，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英国学者赫伯特·斯宾塞尔的《社会学研究法》；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是这方面的代表研究成果，而且被章太炎、严复先后最早地翻译到中国，对大清朝封闭的农业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在严复译的英国爱德华·甄克斯所著的《社会通论》中指出：中国社会“宗法之社会也”，“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②。按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直报》1895年2月4日。

② 严复：《社会通论》按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6、928页。

照甄克思的观点，“宗法社会”的文明程度要低于“军国社会”，还处于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草昧”时期，而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中国呈现出了严重的病态状况：“夫自旧社会观之，京师番壤也，守令蛇也，固揆之万而一致也。由无意识生贪欲，贪欲生欺诈、生罪恶、生奴隶、生淫、生盗贼，而媚异族，而杀同种。种种败德，不暇缕。”^①显然，这种社会的延续势必会在列强争雄、弱肉强食的时代处于危险的境地。因此，改造这种“宗法社会”的弊病，组织新的“军国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大势所趋。这种学说便为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实行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创造了理论根据。正是近代西方社会学的传播，促使了人们对广泛的社会问题的思考，加速了清王朝的制度的变更。

当然，社会的变革与经济的联系密切相关。社会学的思想几乎是与经济学的传播介绍同时流行于19世纪的中国，王朝的小农经济首先在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比照下，引发了人们富国强兵之路的追求。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从经济自由的中心出发，将国民财富作为研究对象，在交换、货币、价值、价格资本、利润等等方面，较完整地阐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严复是较早将此书引入中国的先行者。严复在译著《原富》中把亚当·斯密的利己主义思想，结合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提出“义利合一”的观点，作为他经济理论主张的基础。他说：“而治化之所以难进者，

^① 大我：《新社会之理论》，《浙江潮》第8期，1903年10月。

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焉。斯密之言，其一事耳。……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矣，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以其无所利也。庶几义利合，民乐从善，而治化之进不远欤。呜呼！此计学（经济学）家最伟之功也”^①。这里严复将财富与民力的创造结合起来，与个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并且强调充分自由的私人经济和贸易，这些思想都对农业经济社会的改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后，梁启超、孙中山等提出的变革思想，又从西方不同的经济学派理论中汲取营养，丰富了严复的经济主张，为近代中国进步的经济改革方案，为改变中国落后经济与封建专制社会，走富国强兵之路创造了理论依据。

其次，西方哲学的新学科的传入与文学艺术界的革命，开启了国人的精神。大清帝国衰落最先是由国民精神的萎缩和沉闷而表现出来。传统的儒学“实用”、“变易”、“循环”等思想观念，限制了人们的思想解放的步履。于是，近代哲学的文化传播被受到特别的重视，当时有人就认识到：“哲学一家遂为过渡时代转移之目的矣”、具有“唤醒国民之灵魂，持示教科之正轨”^②的重要作用。而对大清朝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西方进化论的哲学。康有为最早从《谈天》、《地学浅释》、《格致汇编》

① 严复：《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58～859页。

② 冯葆瑛：《哲学源流考识》，上海广学会光绪32年印刻。

等科普读物中，把西方进化论观点和儒学今文经学结合起来，阐述他的历史观。并且主张庸俗进化论，承认事物的量变、渐变，否认事物的质变、突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当然，系统介绍西方进化论的第一人无疑是严复，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就是一部阐述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明之一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著作。严复以《天演论》为译名引入中国，震惊了思想界。康有为和以后的孙中山等革新思想的先驱者，都是从此中获得激励奋进的力量。大清朝面临列强瓜分，最明显的是进化论的以强制弱。这也从正反面提醒人们弱者要想生存必须转变为强者的道理。同时，进化论的本身具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也有可供学习借鉴之处。进化哲学可以说形成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与哲学相近的文学艺术，是人们思想意识转变的直接载体。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引发的阶级矛盾尖锐化，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衰败。开明人士学习西方、改革内政、对抗外国侵略的呼吁，最先表现为接受进步文学艺术新思潮的产生，突出的反映是1898年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率先在文艺领域举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三大文学革命改良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扩大改良宣传，创办了《时务报》、《新民丛报》，倡导一种新颖的见解和生动活泼的文字的“新文体”。除内容之外，也要求形式的革新，即提倡文学语文合一而呈现的白话文运动。裘廷梁1898年在江苏创办白话学会，创刊《无锡白话报》，认为“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以开通民智，传播新知识。

“诗界革命”是维新派倡导的诗歌革新运动。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等厌恶宋诗派、同光体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发起做新诗，主张诗要求“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表现新思想、新事物，而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诗潮。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①的创作原则，强调写诗要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感，反映现实生活。这场“诗界革命”运动以诗歌记述时事、人物，评说国政，吟咏历史，抒怀山水等等，她以广阔的创作题材，强烈的时代气息，对鼓荡民主革命，活跃人民思想，促进社会变革，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02年的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鼓吹“小说界革命”，阐述小说社会作用以及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密切联系。梁启超认为小说是开启民智的最有效的艺术手段，具有“改良社会”，促进立宪政治形成的重要作用。“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②。总之，西方进化哲学的引进与文学艺术的三次革命运动，对清王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波。

再次，清王朝的教育变革在主动与被动之间进行，教育的两难选择经历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潮的冲击，而确立了近代新的教育制度的萌生。更重要的是，大清朝的岌岌可危在很大

① 黄遵宪：《杂感》，《人境庐诗草笺注》上册。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饮冰室合集·文集10》第2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页。

程度上正是由自身不断被动地调整教育体制中显现出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甲午之战败兵以后很快为一大批思想家所接纳，他们抨击科举制度，主张推行西学教育，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诸如军事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实利教育、美育教育等重大改革。洋务派的代表李鸿章最早认识到传统教育制度培养不出适应洋务事业的人才，他说：“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①。为此，必须实行教育改革，变通“考试功令”，另设专门学堂，招收“资稟颖悟，根器端静之文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推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②，以便国家选用。

清王朝随后采取了两项重要举措，即积极兴办新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清王朝的教育改革本来并不想触动朝政的改良，“变器不变道”。可是，举措的本身已经将其推到了鲜明比照的境地，新式学堂和留学生的大量出现，使得自身落后、闭塞、专制的封建性种种弊端受到西学的现代性的挑战。新兴的知识分子和新兴的文化，正是由此生长起来。清政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突出在兴办外国语学校、新式军事学校、专门技术学校三个方面，培养接受新学的人才，改变传统的科举制度下的八股、因袭、呆板，缺乏创造性思想才能的弊害。同时，又派遣大量留学生到欧美各国学习，直接感

①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53页。

② 《同治2年2月初10日江苏巡抚李鸿章奏》，《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0~141页。